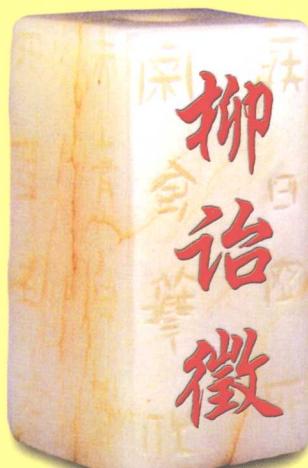


馆藏拂尘

中
国
文
化
史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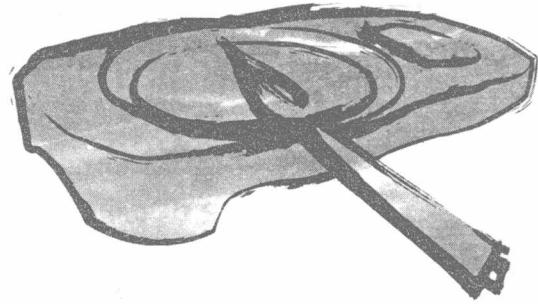
中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 著





目 录

绪 论 1

上编 上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人种之起源	3
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12
第三章 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源	20
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26
第五章 文字之兴	32
第六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	40
第七章 衣裳之治	47
第八章 治历授时	55
第九章 唐虞之让国	62
第十章 治水之功	71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79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91
第十三章 忠孝之兴	100
第十四章 洪范与五行	107
第十五章 汤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113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121
第十七章 传疑之制度	135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兴	144
第十九章 周之礼制	155
第一节 国土之区画	159
第二节 官吏之职掌	164
第三节 乡遂之自治	168
第四节 授田之制（附兵制）	174



第五节	市肆门关之政	181
第六节	王朝之教育	186
第七节	城郭道路宫室之制	193
第八节	衣服饮食医药之制	197
第九节	礼俗	210
第十节	乐舞	218
第十一节	王朝与诸侯之关系	226
第十二节	结论	231
第二十章	文字与学术	237
第二十一章	共和与民权	249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255
第二十三章	学术之分裂	271
第二十四章	老子与管子	279
第二十五章	孔子	287
第二十六章	孔门弟子	304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	315
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	331
第二十九章	秦之统一	351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361
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370
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378
第三十三章	建筑工艺之进步	399

中编 中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417
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	425
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430
第四章	南北之对峙	442
第五章	清谈与讲学	449
第六章	选举与世族	460
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468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483



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494
第十章	佛教之反动	506
第十一章	隋唐之统一及开拓	514
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	524
第十三章	隋唐之学术文艺	544
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560
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	569
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583
第十七章	雕板印书之盛兴	593
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	599
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614
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	627
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645
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664
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	683
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710
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721
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730

下编 近世文化史

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765
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	775
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满清之勃兴	786
第四章	西方学术之输入	798
第五章	清代之开拓	818
第六章	满清之制度	829
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840
第八章	康乾诸帝之于文化	850
第九章	学校教育	861
第十章	考证学派	871
第十一章	国际贸易与鸦片之祸	881
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896



第十三章	外患与变法	907
第十四章	译书与游学	935
第十五章	机械之兴	953
第十六章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968
第十七章	法制之变迁	981
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996
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1016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自太古至秦、汉，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以降，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然自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扰乱分割之状。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吾，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于此时期，有一大事足纪者，即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历史，所当致疑者二事：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欲解此二疑问，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

（一）则坏于盗贼无赖也。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故自汉以来，增进文化之力，恒不及摧毁凿削之力之强。观隋牛弘论书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书·牛弘传》：“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及秦皇取宇，……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此则书之一厄也^①。……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官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属刘、石凭陵，京华复灭，朝章国典，





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书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以官书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则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实文化之大仇敌。民之憔悴呻吟于疮痍水火者，非从容休养，不能增益其文教。从容休养数百年或百数十年，即加以一大劫。如

《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曰：‘仲尼以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②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进步，而且日见退化之故也。

(二) 则坏于科举利禄也。科举之制，为此时期之产物，发源于汉，而大备于唐。而其为弊亦即累积而不可返，史策所载，当时之人，论列其弊者夥矣。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③

《旧唐书》薛登《论举人疏》：“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又赵匡《举选议》：“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于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



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奖竞召伪，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义相反。夫人民止知尚利禄，而不尚道义，非独科举为害也，即行学校之制，亦足为害。班固论汉代学校，已斥其禄利劝人。

《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宋代尝有意于学校，然亦无非以利禄诱之。

《文献通考》：“宋熙丰复立三舍之法，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

是学校、科举，名二而实一也。论者徒谓汉以后学校、科举，一本儒术，故以国家社会之不进步，归咎儒家。实则教育之根本既歧，无论崇尚何种学术，皆不能免于腐败也。

(三) 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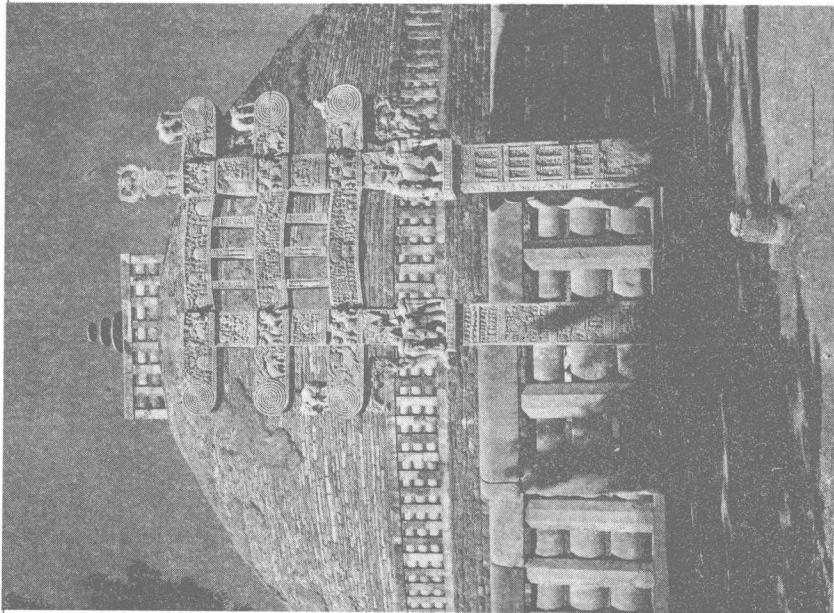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而其效不可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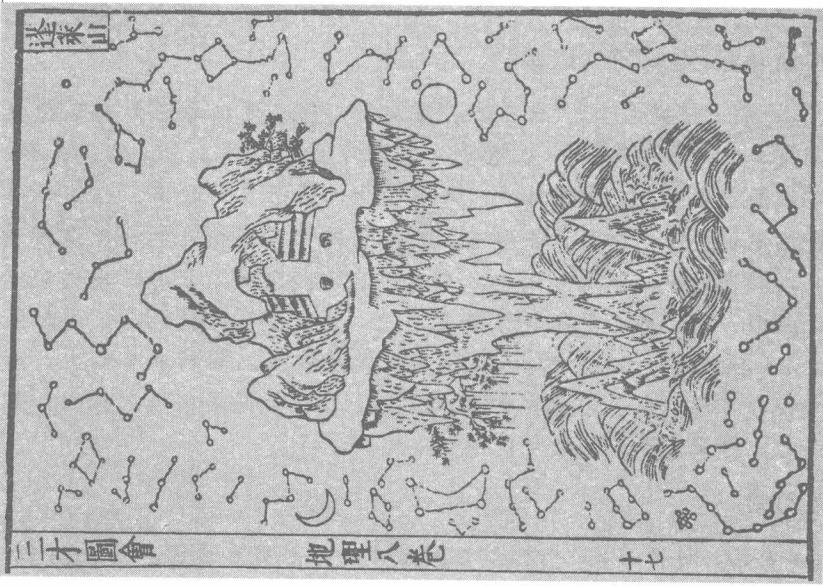
《史记·封禅书》：“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羈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之言神词者弥



印度最早的佛塔——桑吉塔



蓬萊山圖





众。然其效可睹矣。”

东汉图谶、占候之学，与神仙、方技之说相混。《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有学星占图谶者^①，有治神仙方技者^②。而张角、张陵、张鲁之徒出。

《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三国志·张鲁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其流为孙恩、卢循等。

《晋书·孙恩传》：“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人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会稽内史谢赜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会稽、吴郡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刘裕大破恩于沪渎，恩遂远进海中。……恩穷蹙，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③

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此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的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虽仅以神异动颤愚。





《晋书·艺术传》：“佛图澄妙通玄术，……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鸠摩罗什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姚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其继，则以译籍开慧智，语上语下，胥可起人之信仰。此则吾国由无宗教而有宗教之故也。

(四) 则东西交通之适合也。吾国东南皆滨海，以航海术之未精，往往求海上新地而不得。

《三国志》：“孙权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⑦

北方沙漠苦寒，人亦多不愿往。惟西方大陆绵亘无际，城郭之国，与汉俗同。

《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

虽有身热头痛、绳行沙渡之险，

《汉书·西域传》：“皮山以南，国或贫小，乞匱无所得。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盐石阪，道陻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峰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然其行也有数道。

《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



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⑧

故自汉以降，交通不绝，而佛教自西而东，以大月氏、罽宾为转输之中心。

《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为匈奴所灭，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翕侯。后贵霜翕侯邱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邱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

《地理志考证》（丁谦）：“印度史，西历纪元之初，鞑靼^⑨在印度北境，立一大国，四邻咸服。其最名之王，名铅尼希加^⑩，以卡希米^⑪为都，属国甚多。南至亚格拉^⑫，及沁特^⑬，北至耶根德^⑭、可根德^⑮云云，即指贵霜王父子。”

《东洋史要》（日本桑原骘藏）：“汉明帝永平三年，迦腻色迦王君大月氏，雅响佛法，会五百僧侶于罽宾，为四次集会^⑯，佛教徒多来集于大月氏。维时，北印度为佛教之中心，自西北两印度，经中亚，囊括葱岭以东、于阗、疏勒诸国，故天山南路未几佛法遂昌。会中国汉明帝出，锐意辟疆，与西域之关系滋密，佛法与中国境，浸获东渐之机。”

西僧之来中土者，多月氏、罽宾之人，而吾民之往彼者，始则仅诣其传播之区，继则直诣其发源之地。有往还皆遵陆者，有陆往而海还者，其道孔多。故所得于西方者，为他三方所莫及焉。

注释：

①此事须与第一编所引刘大櫆《焚书辨》参看，实则秦书之焚，乃是项羽等所为也。

②自项羽烧咸阳，至周师入魏，实七百一十年（自公元前 206 至公元 554 年）。此七百年中，大劫五，小劫尚不可胜计。

③魏晋以降，多用九品中正举人，然亦常举行州郡孝秀之制，试以策问。梁沈约尝论之曰：“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者，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④如唐檀、公沙穆、董扶之类。

⑤如费长房、蔚子训之类。

⑥循后亦为刘裕所败。

⑦《史记》言：“求三神山者，临之，风辄引去。”即缘航海术不精



之故。

⑧按此惟指新疆一方而言。据《史记·西南夷传》：“蜀布、邛竹杖，从身毒国来。”则川、藏间西行之道，当时已有踪迹矣。

⑨即大月氏。

⑩即迦腻色迦之异译。

⑪即克什米尔。

⑫中印度地。

⑬西印度地。

⑭当即濮达。

⑮当即高附。

⑯其先已有集会三次。





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

印度无历史，佛书亦不以纪年为要，故佛之时世，言人人殊。

《魏书·释老志》：“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说之备矣。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六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释氏稽古略》（释贊宁）：“稽夫如来之生也，当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当昭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灭度也，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①

《东洋史要》：“佛教祖师名瞿昙悉达多，一作乔答摩悉达，或号为释迦牟尼，中印度迦维卫国^②王子也。生于周灵王之十五年，约与孔子、老聃同时。释迦见人类不能离生、老、病、死四者之苦，遂出家入山，求解脱法。新辟一宗教，力反婆罗门所为，唱说平等主义，抉差别种姓之藩篱，谓一切众生，不问其所自出，但能杜绝邪欲，脱离世网，即皆可以于未来受无量福。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入般涅槃。”

吾国固有之佛字，惟以仿佛为义，非以称释迦也。

《说文》：“佛，仿佛也。从人，弗声。”

后世附会之说，谓孔子时已知西方有佛。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见孔子，问：‘三王五帝圣者欤？’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其言固不足为据。即谓西汉获休屠王祭天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

《魏书·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③。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亦不足为佛教入中国之证。

《休屠王金人考》（日本羽溪了谛）^④：“霍去病获金人时，当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时代（公元前二七二至前二三二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始有雕刻。至公元前一二世纪制作之石垣石门，均无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后者只表佛足之形。缘其时学者，以为佛之形像，神圣不可亵渎也。其后至犍陀罗美术，始有佛像之制作，实当公元后一二世纪顷。故知公元前一世纪，无所谓金身佛像也。”

佛教之入中国，盖在西汉之末，东汉之初。

《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

世或谓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始得佛经，说亦未确。

《释氏稽古略》：“佛教流通东土之始，永平七年，帝梦金人，长大，顶有白光，飞至殿庭。旦问群臣，太学闻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时，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长一丈六尺，而黄金色。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书》异记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邻境月氏国，遇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奉佛经像来震旦，遂同东还。”^⑤

《魏书·释老志》：“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造像。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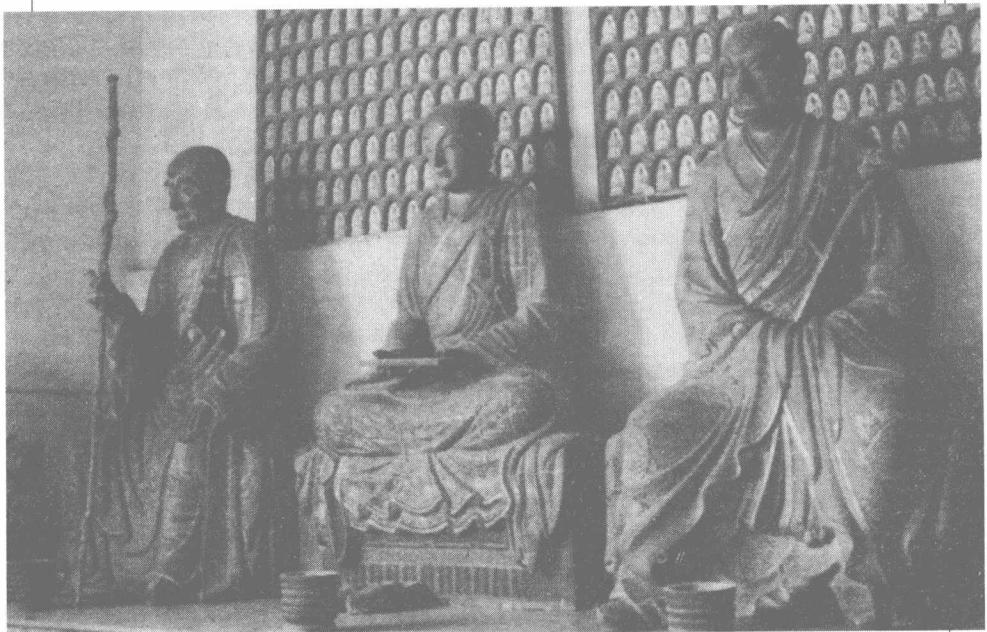
盖蔡愔等永平十年始还，

《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宋程辉）：“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





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中的佛像